



抗战烽火淬砺了南开

(代序一)

薛进文

南开大学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毁掠并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也是侵略者在中外记者会上公开宣布要彻底炸毁的教育机构。抗战的烽火淬砺了南开，新生的南开堪称近代以来中国高校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 南开大学因爱国传统而罹难

南开大学是著名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创办的，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国传统。1898年，张伯苓在威海卫亲历“国帜三易”之耻，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张伯苓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开始了艰难的办学之路。

南开大学开办之际，五四运动方兴未艾。首批入学的周恩来、马骏等南开学子，积极投身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在此后纪念“五七”国耻、声援五卅运动、声讨“三一八”惨案等爱国行动中，都活跃着南开学生的身影。南开校长张伯苓对学生的爱国言行亦予支持，“五四”时曾致电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吁请释放被捕学生。1927年，他赴东北考察，深感“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回津后组建“满蒙研究会”（翌年改名为“东北研究会”），开展东北三省实地调查，搜集日本侵华罪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召集全体学生慷慨陈词：“中国之前途较日本有为，吾不应畏日人。”“望国人万事求己，切忌倚人为助。”他要求南开学生把此次国耻“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志不忘、至死不渝之

志”。师生们随后组织了以张伯苓为主席的国难急救会，以实际行动支持长城抗战，慰劳前方将士。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南开啦啦队在全场观众和日本领事面前打出“毋忘国耻”等旗语，更是成为激励国人的爱国壮举。

1935年华北事变后，平津危急。包括南开学子在内的天津学界为响应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大游行。全体三百多名南开大学学生还乘火车南下入京请愿，被阻沧州时，同学们在天寒地冻中忍饥挨饿、坚持斗争，向车上旅客和车站附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连教育部前来劝阻的特派员亦被感动落泪。《大公报》为此发表短评指出：“南大的学风，在华北是一大特色，这些优秀青年的爱国纯情，可以使人敬佩……不知道要感动全国多少人！南大此次是单独行动……我们盼望诸君，常能给学界表示模范的精神与行为。”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南开教师在坚持为国育才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学术专长实现着报国救国之志。在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化工系的技术支持下，天津爱国实业家赵雁秋创办了利中制酸厂，打破了日企对华北市场的垄断，极大振奋了民族工商业者抵制日本经济侵略的士气。南开经济学人还在天津《大公报》创办《经济周刊》，研究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其中关于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研究，有力揭露了日本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论调，实质是“使中国完全地殖民地化，以供给其工业及军事所需的材料，并且推销其工业的生产产品”。

南开的爱国教育和行动，对张学良将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16年，张伯苓在沈阳作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对时局感到前途渺茫的张学良听后，“志气为之大振”，从此立志救国。1930年底，张学良应张伯苓之邀视察南开大学，讲话中提到了14年前的那次演讲，说最令他感动的就是“不要抱怨别人，靠自己干”这一句，自己“所以有今日，亦实南开之赐”。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大学还接收了大批东北大学流亡学生，予以尽心培养。

南开师生的爱国行为，使日本侵略者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1937年7月29日凌晨，南开大学受到日军炮火袭击。午后，几十架日机对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数个非军事目标狂轰滥炸。30日下午，日军继续炮击南开大学，并派出骑兵百余名及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中央通讯社报道：“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经此劫难，南开大学成为一片废墟，仪器设备被毁殆尽，珍贵图书典籍和成套

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重达一万三千余斤刻有《金刚经》的校钟亦被劫掠。据 1943 年 9 月 25 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物资损失，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 663 万元。

二 南开大学在抗战烽火中愈益奋励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张伯苓即在庐山国是谈话会上讲：“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南开大学被炸毁当日下午，张伯苓在南京向报界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被毁不到月余，张伯苓最疼爱的四子张锡祜，奉命驾机开赴前线作战，中途遇难，牺牲时年仅 26 岁。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南开被毁，举国震怒，举世声讨。如黄炎培在上海《大公报》正告日寇所言：“尽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

南开大学被毁后，很多进步学生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号召，分赴各地参加抗日斗争，其他师生也都辗转南下，加入与北大、清华两校合组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 2 月，学校奉命再迁昆明，两个月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历时八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却能以“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国家民族培养复兴之才，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身处西南边陲的南开人，还继续发扬“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传统，以修筑石佛铁路进行沿线民情风俗调查为契机，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以协助推进边疆教育为目的”，对滇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语言民俗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并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油印出版了《语言人类学专刊》和《边疆人文》（双月刊）。

西南联大期间，出现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从军热潮。南开在联大三校中虽办学规模最小，但也有很多学生投笔从戎，包括 1935 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申泮文，1936 年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

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1940年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查良铮（笔名穆旦），以及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1938年壮烈殉国的何懋勋烈士。

何懋勋爱好文艺，擅长演讲，在校期间曾组织诗社，出版诗集。他成绩优异，思想进步，投身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何懋勋进入长沙临时大学读书，并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3月，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鲁西北参加抗日工作，任游击总司令部挺进队参谋。8月，何懋勋率领的武装宣传队陷入日军重围，他在血战中英勇牺牲，时年21岁。聊城民众为何懋勋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并立碑纪念。他的同学刘兆吉一年后创作两幕话剧《何懋勋之死》以示缅怀。在1995年所立西南联大烈士纪念碑基座镌刻的15位英烈中，何懋勋名列首位。

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召集人唐际清在致辞中说：“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3月，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杜建时也向他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三 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南开精神

南开自创办一路走来，最显著的特征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以“允公允能”为核心的南开精神，经过抗战烽火的洗礼不断升华，成为伟大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的具体体现。

南开精神是爱国爱群、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南开大学开办之初，便确立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进一步提出：“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1934年颁布的“允公允能”校训则强调，致力于培养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张伯苓亦常以“团结、为公”勉励学生：“诸事可变，南开精神不可变，一致为公，始终不渝。”“南开精神，即南开训练目标，第一是‘公’，第二是‘能’。”“应培养新的精神、新的校风，即造成‘公’‘能’的精神。”张伯苓反对只空喊口号而不做实际工作，主张把爱国的精神和报国的能力结合起来。他说：“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期，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

南开精神是自强不息、愈挫愈进的奋斗精神。南开被毁后，时人对不屈的南开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1937年7月31日，媒体发表社评《南开精神》，赞曰：“62岁的老人，34年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的精神。”10月17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短评《祝南开》，文谓：“凶残的敌人，毁了旧南开校舍，却更发扬了新南开精神。南开其实是因祸得福，失去了几栋校舍，却得了教育救国的真髓。”1939年1月10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南开校友总会在重庆举行的聚餐会，即席发表讲话称：“南开传统的精神为抗日与民主，为苦干、实干与穷干……望各校友发扬此种可贵的南开精神，为抗战建国而努力。”西南联大期间，三校共同遵奉的“刚毅坚卓”校训，更是与南开人自强不息、愈挫愈进的奋斗精神融汇在一起，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强敌和困难面前不屈的风骨、必胜的信念。

南开精神是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张伯苓常以“开拓、进取”概括南开精神。1916年9月，他在南开学校修身班讲演时说，欲富强中国，国人必须打破保守，保持进取精神，进而阐发“南开精神”深意，即“有毅力，有信心，无不达其目的”的精神。1942年4月，张伯苓向重庆南开中学学生解释操场石阶草坪上“日新月异”四个大字的含义时说：“这四个字是说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走在时代的前列，这是南开精神……”“日新月异”后来与“允公允能”共同成为南开校训，要求师生在追求和践行“公能”过程中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张伯苓一生办学历经坎坷，却始终以开拓进取精神坚持到底，他常讲：“南开，南开，越难越开”；“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奋发图强”。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南开师生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爱国爱群、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愈挫愈进的奋斗精神，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这既是伟大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在南开的具体体现，也是南开大学砥砺前行不竭的动力。南开人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过程中，将继承发扬南开精神，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足以告慰前哲、不负后人的贡献。

（作者为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允公允能

張伯苓題



公能教育与振兴中华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代序二)

龚克

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向兴的历史转折点。实现这个伟大的转折点，多少代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艰辛探索流血牺牲，其中有南开学校和南开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纪念抗战胜利 70 年，要总结历史经验，发扬优秀传统，更要担负起历史责任，完成好南开先贤的未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 南开立校初衷是救国强国

自上古以降，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若璀璨之光芒，为民族之光荣与骄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竟于世界科学与工业革命兴起之时沉湎于浮华、羁绊于旧制，“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清光绪《明定国是诏》）。国势颓危，外辱频至，自 1840 年败于鸦片之战起，屡战屡败，丧权辱国，赔银数以十亿两记，割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在民族经此千年未有之大变难的历史时期，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寻求救国救亡的道路。生于 1876 年的张伯苓，先是投身北洋水师学堂以图救国，不料甲午一战海军丧尽。1898 年，张伯苓在威海卫目睹“国帜三易”，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这一年张伯苓结识了倡导新学的严修，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开学校的创立就是为了救国强国。张伯苓先生在抗战胜利前不久所撰的《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一文中，专门写了“创校动机”一节。他先讲“南开学校之创办人，为严范孙先生”。严先生“目击当时国势阽危，外侮日急，辄以为中国欲图自强，非变法维新不可，而变法维新，又非从创办教育不可”。接着，张先生又说到自己，“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张伯苓先生进而阐述南开“办学目的”，指出“南开学校系由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人救国”，“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一语道明了南开立校之初衷，全在“育人救国”“以图自强”。

二 抗战胜利中有南开人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寇对我中华之侵略，非始自七七事变，亦非九一八事变，甚至也不是“甲午海战”，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严重、最嚣张的部分。纵观日寇侵华历史，深叹清廷腐败忍侮、军阀引狼入室，致使先据辽东、台澎，后占东北、分裂满洲，再越过长城、驻屯华北乃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致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七七”以来，国共合作、全面抗战、持久坚持，以顽强之民族精神、广泛之民族团结、巨大之民族牺牲，加之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相互支持，终于获得自鸦片战争百年来抵御外侮的首次全面胜利，从而一改国家之命运，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由衰向兴的历史转变。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过程中，有南开人和南开学校之不可磨灭的贡献。限于笔者手头资料不足，仅举几点以为例证：

一是南开为唤起民众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建校以来，南开教育即倡爱国反抗侵略。九一八事变当日，张伯苓即在津发表“吾人之责任与自救之道”的讲话，之后又在南开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上演讲“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表明爱国态度。之后，全国抗日热潮兴起，南开是其中重要力量，以一二·九运动为突出代表的历次抗日学运，南开均是中坚力量之一。在1934年华北运动会上，南开学子亮出“毋忘国耻”、唤醒国人“收复失地”，致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离席而去，而张伯苓先生则拒不向日本代表道歉，此事成一时佳话。由于学生坚决抗日的态度与行动，引起侵华日军

的注意，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就多次闯入南开校园进行搜查，后来竟欲在南开校园进行演习，南开师生坚决抵制，与日寇的对抗日益加深。在一二·九运动中，南开学生走出学校、走出天津，南下沿途宣传抗日，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是南开为抗战做出巨大牺牲。由于南开的爱国教育和南开师生的爱国行动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恐惧。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进攻天津，于1937年7月29日悍然轰炸南开大学，30日又轰炸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并继续轰炸南开大学，轰炸不仅由第六飞行队轮番进行，而且动用高射炮“把原本对空发射的大炮向南开大学校舍、图书馆进行猛烈射击”（见日本千叶大学金山彦喜教授信函），之后又派陆军进入校园放火，致校园全部毁坏。日军野蛮轰炸不为别的，就因为“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日军新闻发言人语）。据当时住在天津的目击者美国人格蕾丝·狄凡所写：“当燃烧弹击中政府大楼和南开大学的时候，浓烟夹着火苗冲天而起。林爱德（一位南开教授的美籍夫人）望着曾备受保护的校园被毁坏的情形，依在格蕾丝的肩头上痛苦地抽泣起来。这个离城只有几英里远，有着莲花池、林荫道的舒适校园，因为有藏书众多的图书馆、大型的学术楼和研究设施而享誉国际。林夫人愤怒地指出这次袭击是对最近南开大学学生的抗日游行示威活动的残酷的报复。”（《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

对此毁灭性的轰炸，张伯苓校长于7月30日发表谈话称“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次日，张校长又对蒋介石说：“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蒋当即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南开被毁，国人震怒，世界震惊。当时黄炎培、胡适、郭沫若等各界人士以及上海等各地各界纷纷公开致电，愤怒声讨日寇暴行。国际上亦广泛谴责日军这一无理无耻行径，甚至当年日本驻华领事田中彦藏也不得不承认“炮轰南开大学是不可原谅的事件”（《天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

可以说，南开此一巨大牺牲，也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大激励。

三是南开与清华北大合组西南联大创造了抗战教育之世界奇迹。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记述着这段历史，碑背铭刻的834位联大期间从军学生的名录，承载着联大人（南开人）

的爱国价值观并至今浸润着南开后来人的爱国情怀。

四是南开人在抗日战场上的流血牺牲。这方面材料搜集得很不够，对已有资料笔者了解又极有限。仅笔者知道的，就有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牺牲的陈镜湖烈士，1938年在山东抗战中牺牲的何懋勋烈士，等等。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五是南开人对统一战线的重要贡献。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是此前上溯至鸦片战争都没有过的，乃是抗日战争能一改以往屡战屡败之辱，扭转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南开学校及其师生即积极参加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活动。1932年张伯苓参加“废止内战大同盟”并任常委，又南开召开天津各界参加全国废止内战大同盟筹备会，确定“（一）联络路工，使不与内战者妥协。（二）多征军人为会员，使其不参加内战。（三）财界不供给内战用款。（四）宣传。（五）募款（未表决）”（1932年7月21日《大公报》）。至1936年“西安事变”，国共为抗日停战，南开人对抗日统一战线更是做出突出贡献。最突出的代表当数周恩来，他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是统战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和直接执行者。他代表毛泽东多次参加国民参政会，并出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派驻国民政府代表，为维护和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投降妥协，反对分裂摩擦，立下了永载史册的丰功伟绩。

另一个突出代表是张伯苓，这位“两园桃李一手栽”（陶行知语，他注明“两园桃李”是指国共两党中的南开学生）的南开校长，在战时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国民参政会是在中共提议下组建的战时民主机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机构，先后由汪精卫和蒋介石担任议长，而张伯苓是唯一的副议长，后改为主席团制，张亦多次担任主席团主席，为抗日统一战线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37年6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张伯苓被遴选为参政员并任副议长。同时，张发表谈话称“参政会之目的，乃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盖中国今日之局势，非全国共同一致奋斗，不足以挽救危亡。”（1938年6月18日《新华日报》）

此前张伯苓专心教育，从未担任公职，出任国民参政会实为抗日，亦是他一贯爱国精神使然。张能立身于众多社会贤达之中且充任领导，除先生自身威信外，先生对南开的贡献和南开对抗战的贡献，亦应为不可忽视的因素。

以上五则，虽挂一漏万，但已能揭示南开于抗日之功，它为我们诠释了

什么是南开的爱国传统，这一历史贡献不仅载入史册，亦活在一代代南开人心中。

三 公能教育是救国强国教育

南开作为学校，其对国家和抗战的贡献，必深植于南开教育——公能教育之中。南开的公能教育，在理念上，用一个“公”字凸显了南开要为公育才、育为公之才，用一个“能”字凸显了南开重视学生的能动性和做事成事的能力。显然，“公能”包含了“德才”又超越了“德才”，是南开教育的核心价值。在实践上，当年南开以“公能”为依归开展五项训练，即体育、科学、团体、道德和爱国，包含了书本和课堂的知识教育又大大超越了知识教育，是课上与课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全面教育。公能教育之所以成功地为国家育出一大批栋梁之材，端赖其理念正确先进、其实践全面彻底。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公能教育的开创者。他早年投身北洋水师学堂，颇受严复思想的影响。严复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是思想解放、探索救国真理的先驱人物。毛泽东曾将其与康有为、孙中山并举，给予高度评价。1894年中日于黄海一战，作为数十年洋务运动之最显耀成果的北洋水师殁于海底，洋务运动归于失败。次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著名的《论世变之亟》一文，轰动朝野。他深刻指出，洋务运动学习西洋之所以失败，乃在于不得要领，仅仿之皮毛。他说：“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之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严复先生这番话，今日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中国真正要学习的西洋进步之命脉，乃是科学与民主啊！这是严复非常著名的思想，深受严复思想影响的张伯苓先生所开创的公能教育，亦应包含了“科学与民主”教育的深刻内涵。对公能教育思想的深入发掘，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和发展公能教育是极有意义的工作。

四 为中华振兴做出南开新贡献

抗战胜利扭转了中华民族命运，新中国的建立更是为民族复兴创造了政治条件。70年来，几经曲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终于成功地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饱经苦难的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要在全球化风云变幻、科技革命引发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国家间及国家内发展差异造成多种矛盾冲突、整个地球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严峻挑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实现振兴中华的两个“百年目标”，急需“允公允能”的一代新人。为此，新时期的公能教育，是当代南开人的历史责任。

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张伯苓校长回顾南开既往奋斗之史迹，瞻望南开发展之前途，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话。请允许我敬录这段话作为此文的结语，与南开同仁们共勉：

“南开之事业无止境，南开之发展无穷期，所望我同人同学，今后更当精诚团结，淬砺奋发，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怀勇往直前之气概，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并驾齐驱，东西称盛。是岂我南开一校一人之荣幸，实亦我华夏国家之无疆之光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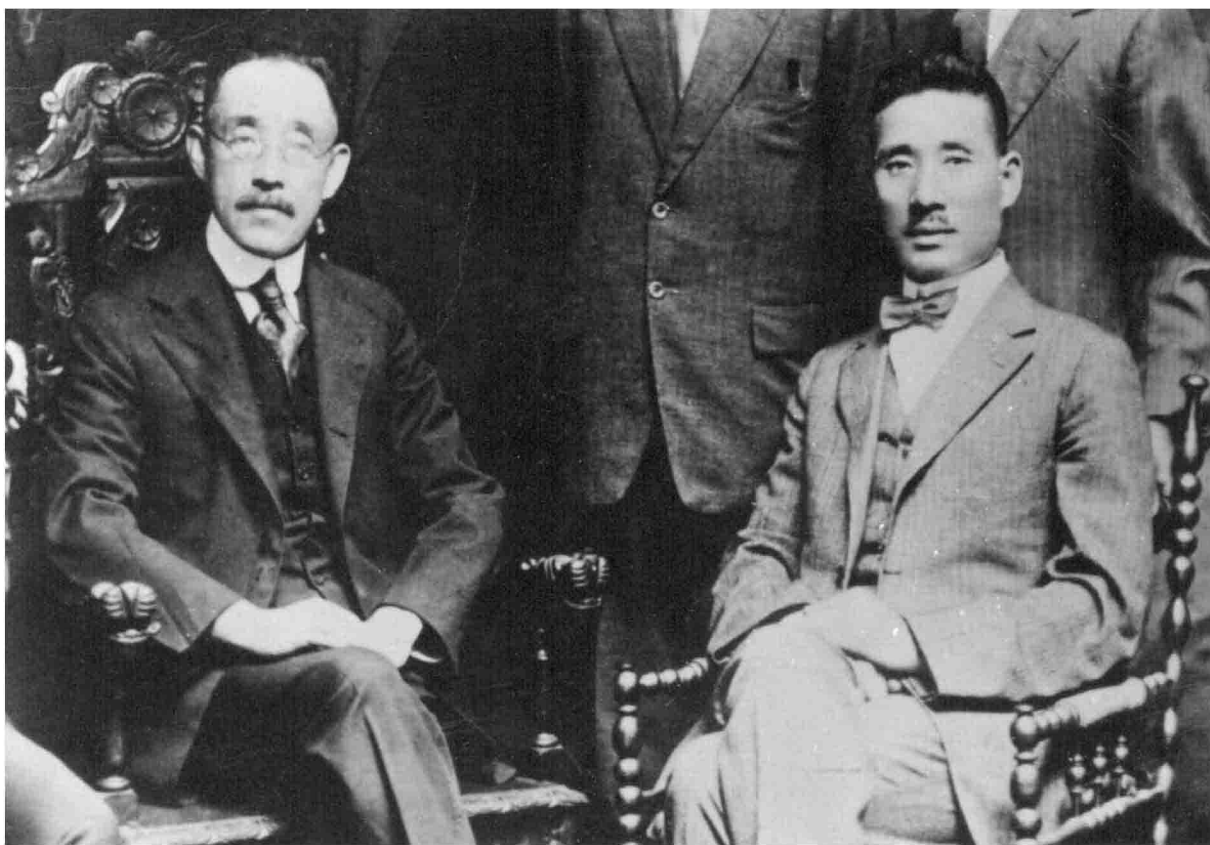
（作者为南开大学校长）

目 录

一 巍巍南开 爱国抗日	1
二 日寇肆虐 毁我南开	15
三 合组联大 弦歌不辍	32
四 团结抗战 民主进步	50
五 投笔从戎 报国从军	56
六 北返复校 重振南开	74
七 学脉永续 精神永存	81
后记	93

— 巍巍南开 爱国抗日

南开大学是由爱国教育家严修(1860—1929)、张伯苓(1876—1951)创办的,是一所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高等学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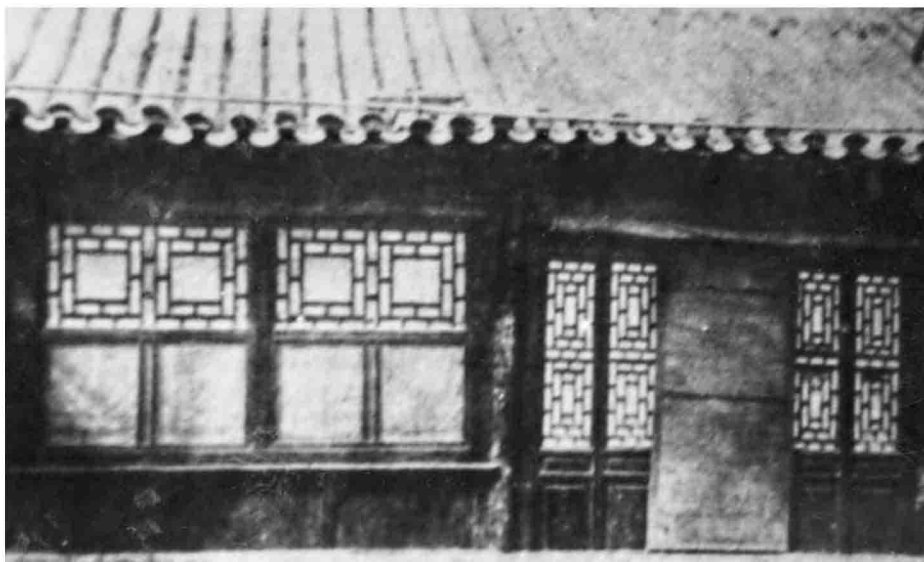


校父严修(左)与老校长张伯苓(右)于1918年赴美考察教育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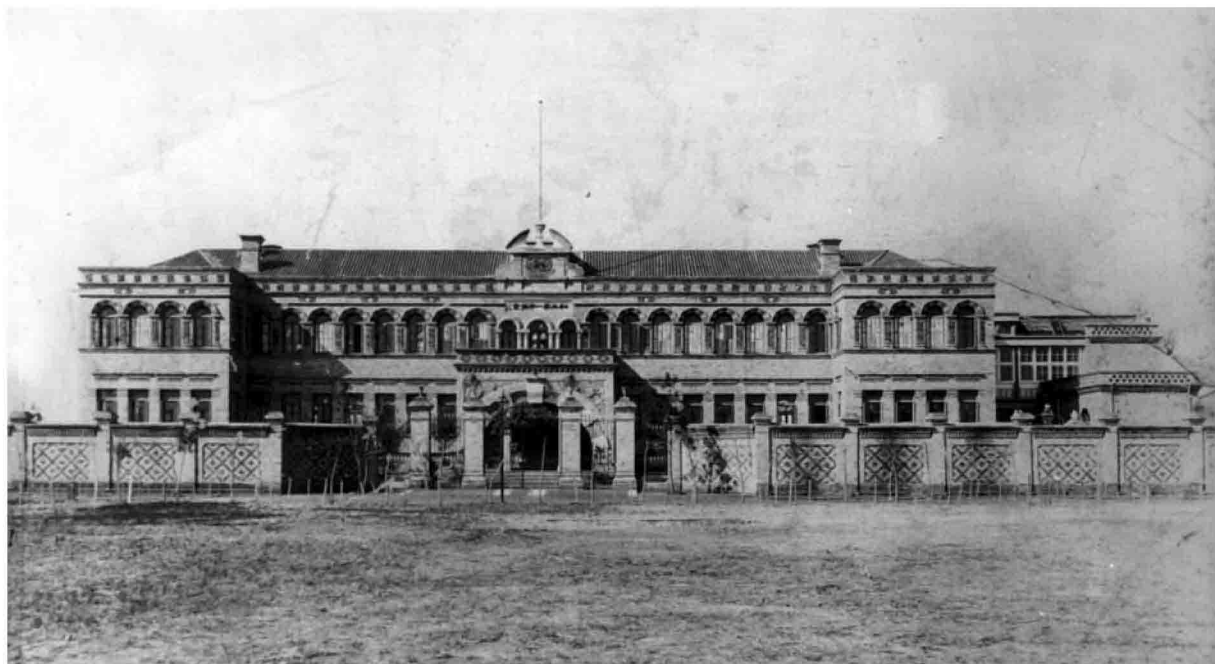
北洋水师学堂时期的张伯苓

1898年，张伯苓亲历“国帜三易”之耻（清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被占的威海卫之后，又被迫租与英国），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张伯苓弃武从教，在天津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受聘执教于严氏家馆。



南开系列学校发祥地——严氏家馆

1904年，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遂将家塾扩充为中学（1912年更名为南开学校）。后经多年筹备，于1919年开办了南开大学。



南开学校东楼



1919年南开大学开办之初在南开学校中学部南端所建校舍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合影(最后排左一为周恩来)

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南开学子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

南开大学开办之际，五四运动方兴未艾。首批入学的周恩来、马骏等南开学子，积极投身这场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时期的周恩来